

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

陈长里, 陈莉妤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经历了一个“建党”“治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过程。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共产党治党理论, 列宁在苏联革命建设中使俄共(布)执政理论得以落地, 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 对共产党领导思想进行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不同时期党的历史任务, 不断深化、推进“从严治党”思想。党的十八大后, 习近平果断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一个统帅”“一条主线”“两个翅膀”“一个底线”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使“从严治党”思想实现了时代创新, 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 历史演进; 时代创新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2-0078-07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of Marxism Theory on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Strictly

CHEN Changli, CHEN Liyu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strictly of marxism theory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from “Party building”, “Party self-governing” to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strictly in every respect”. In Marx’s works, there are rich Party governance theo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Lenin carried out the ruling Party theory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Party) in the Soviet revolution. Combining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China, Mao Zedong explored leadership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it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deepened and pushed forward the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strictly” constant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tasks of the Party in different times.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in every respect” decisivel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roposed to build a Party system of “one commander”, “one mainline”, “two wings” and “one bottom line”, which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m Party theory.

Key words: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strictly in every respect; historic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治国先治吏, 治吏先治党。”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 不仅反映了其价值取向, 也彰显了其目标追求。从严治党思想经历了一个“建党”“治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

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从马克思主义治党理论出场, 到苏联与中国早期的实践探索, 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向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进, 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

收稿日期: 2017-11-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专项课题基金资助项目“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要求及其实现路径研究”(17BGL212)

作者简介: 陈长里(1973-), 男, 湖南茶陵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应用伦理。

的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再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九大)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升华。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党理论的丰富与超越,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党理念的科学诠释。

一 理论孕育:马克思的著述蕴含了丰富的共产党治党理论

马克思虽然历经沧桑和历史考验,并已逝世130多年,但他仍然是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导师,被世人尊为“千年伟人”。他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包括无产阶级政党治党理论不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退化或消失,反而与时俱进,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时代的旗帜和标杆,也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管党”“治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马克思关于共产党性质问题的论述,明确了治党的关键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

从本质上讲,党的性质问题就是一个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首先,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阶级性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其他别的特殊利益;共产党的近期目标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无异。“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283}其次,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于它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和最积极的”部分,它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马克思认为,参加共产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勇敢的士兵”或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无产阶级群众,而不是所有无产阶级成员都有资格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盟员必须“具有宣传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等条件。^{[2]744}这既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又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因。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28}各国政党发展历史反复表明,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才是先进的政党,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落后的政党必然被历史所淘汰。共产党是先进性政党的根本原因就是其生根于广大群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并维护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马克思关于共产党使命的论述,阐述了治党的重点在于“如何做”

马克思认为,从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它的使命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社会,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党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93}首先,无产阶级要使自身及全国人民获得解放,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由工人阶级专政。^{[2]380}马克思认为,只有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才能粉碎敌人的反抗,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465}其次,实行党内民主思想。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和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提出了民主制原则的基本思想,它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明确地反对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并指出巴枯宁的“支部自治”“绝对自治”等造成的危害,鲜明地论述了党的集中和纪律的重要意义。再次,共产党内部一律平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所有党员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特权和歧视,所谓的区别仅仅在于党内的分工和职位不同。每个党员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最后,共产党甘做人民的公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

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3]

二 实践探索:苏中两国早期领导人对共产党执政的实践

为了让马克思关于共产党的理论落地生根,并不断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苏联早期领导人列宁与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各自立足本国实际,进行艰苦卓越的探索,丰富与发展了共产党执政、治党的思想。

(一)列宁在苏联使共产党执政理论得以落地生根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成为了执政党。俄共(布)不仅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执政,而且是在一个内忧外困的生存环境中执政。

首先,俄共(布)执政后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文化建设,党员注重加强自身素质能力建设。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集中谈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经济建设、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俄共(布)执政地位确定后的首要任务在于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这关系到执政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在俄共(布)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纲领《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中,列宁强调:“自从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党内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追求名利地位的异己分子,如果对此不采取措施,这些人就会把腐化等各种旧思想带进党内,从而影响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党的战斗力”,“共产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4]其次,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列宁认为,共产党执政不是为了自身或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而是为了更多的劳动大众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组织和支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5]248},“它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5]304-305}。为使人民群众真正

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列宁认为必须实行人民监督,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这不仅是苏维埃民主的本质要求,还是防止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重要手段。列宁执政时期创造了多种形式、多条渠道的群众监督网络,重视工会在实行工人群众监督中的作用,通过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加强监督。

(二)毛泽东在中国实践让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实现场域转换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一生始终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领导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充分汲取苏联共产党(1952年后的称呼,简称“苏共”)执政的有益经验与惨痛教训,让共产党的领导实践场域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丰富与发展了共产党的治党思想。

首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资格的前提条件。毛泽东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勇气,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6]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前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人民群众才听从党、跟党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共产党员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只为民族和人民求福利,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其次,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领导中枢。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共产党不仅是其他组织和各条战线的领导核心,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还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毛泽东提出将党支部建在连的组织上,强调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领导的中枢”来表达党对军队的

领导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7]的著名论断。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保持领导资格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毛泽东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先后在《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论述了加强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原则、形式和方法。在《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不掌握思想教育,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8]1094}延安整风就是共产党内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举。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全体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所采取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原则及坚持思想教育为主要的理念,有效地避免了乱捕乱杀惨剧的重演。毛泽东为此殚精竭虑,并反复强调整风的目的“在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8]1096}

三 演进与深化:改革开放后“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进

“从严治党”的提出和落实,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深化推进的探索过程,这不仅是历届党的领导人的智慧与贡献,还是全体党员不断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早提出将“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方针,“经验证明,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将“从严治党”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新概念,将反腐倡廉提升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不断推进从严治党。

(一)从严治党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东欧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的无产阶级政党背离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反复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邓小平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共产党的治党思想,明确提出我党我国工作重心放在从严治党和经济建设上,“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10]。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首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为了人民,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面对“文革”造成的灾难,邓小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大家吃饱穿暖,摆脱贫困。在充分肯定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依据和标准,并且把这一思想上升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层次。只有使人民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才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观点,并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加以阐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最终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其次,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面对“文革”带来的思想混乱局面,邓小平充分汲取了马克思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批判继承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果断地恢复与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邓小平眼里,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不仅在于形式民主,更重要的是实质民主,关键在于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民主政治目标是从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邓小平认为,在我国首要的、占先导地位的是党内民主,只有党内实现了民主,才能真正带动人民民主,反过来,人民民主又会促进党内民主,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中。“民主如果在党内不造成,国家也

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11]

(二)江泽民侧重从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加强从严治党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新时期从严治党的重点、难点。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首先,江泽民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是从严治党的立足点。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失了执政地位的惨痛教训,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始终把“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作为从严治党的重点和难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江泽民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增强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其次,反腐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江泽民说,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病毒。腐败问题一直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告诫全党:“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反腐败斗争历史长河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的高度来对待反腐败,从战略的角度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反腐败斗争当作一场新时期的政治斗争,当作一件政治大事来抓。这场斗争成功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把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始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始终捍卫人民的权利,进一步巩固政权。

(三)胡锦涛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主线落实从严治党

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工作重心,科学回答了“治党权为谁授”“谁执治党权”“治党为了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一步推进从严治党,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首先,从严治党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原则。共产党执政没有任何特权,必须遵循执政规律,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一执政方式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执政规律,而且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

其次,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观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宽、松、软”现象,致使腐败形式花样百出,从需求型、贪婪型腐败向攫取型腐败转变,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为一体,大案要案、串案、窝案、集体腐败突出,吏治腐败日益严重,金融腐败、经济腐败愈演愈烈,“裸官”现象频繁出现等,许多党员、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针对腐败的新特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这个新的概念,将反腐倡廉提升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是指反腐倡廉建设逐步走上科学化轨道的状态与过程,就是不断认识和把握反腐倡廉的本质和规律,逐步使反映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思想认识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用这种知识体系来指导反腐倡廉建设实践的过程。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既要符合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又要符合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还要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关键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党的宗旨开展各项反腐败工作,要以人民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为根本标准。

四 新时代升华: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面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变化、“三个全面发展”战略需要以及党员队伍结构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2月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把管党治党提到一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

新高度,获得全国人民、全党与全军的拥护与期待,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要解决新矛盾、完成新使命,关键在于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从此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个以政治建设为统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以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为两翼,以纪律建设为保障的完整严密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确保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一个统帅:党的政治建设

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党的政治建设处于统领地位。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和本质特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充满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所有建设中处于根本地位,因为它决定着党的建设性质与方向。目前,党的首要政治建设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突出了党的干部的政治标准,鲜明地提出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第一,坚守政治忠诚,对党绝对忠诚。“天下至德,莫过于忠。”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忠”德被视为美德和圣德的化身,春秋战国时期分为公忠与私忠。公忠的要求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并作为人生的追求;私忠指忠于君主或上司。中国共产党要求的“忠”是公忠,忠于国家社稷,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或某个小群体。对党绝对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根本政治要求。第二,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站稳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所有党员所做的一切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第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应当始终做廉洁自律的表率,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守党的“六大”纪律,尊崇党章,严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带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一条主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十九大报告指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并以此作为指导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新时代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全党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引导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解决好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牢固树立“四大”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纯洁党性意识,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性意识的核心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责任诠释党性,行动彰显党性。强化党性意识和党性观念,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做到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在思想建设、固本培元的同时,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两个翅膀: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

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到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明清一直延续德法合治的传统。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高度重视政党道德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翅膀或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时发力,开辟内外兼修的政党治理新路径。”^[12]“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依规管党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目前我们党逐步形成以1个党章为根本、2个准则和26个条例为主干的一整套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规则制度体系。规章制度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覆盖管党治党的所有领域,良纪善治必须同德治礼序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共产党的道德承载着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是我党获得民意支持和道义优势的精神旗帜。“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将合乎道德要求的纪律规章,才能更好地转化为党员、干部内心的行为准则。

(四)一个底线:以纪律建设为保障

铁的纪律既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光荣传统,又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政治性的根本保证,还是巩固党内团结统一和始终得到人民拥护

的根本要求。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真正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党中央坚持高线标准、底线要求,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划出了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底线。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一并纳入党的建设中,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纪律要求,并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以法规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发展。

成绩令人振奋,但仍须冷静清醒。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因此,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党的十九大报告分析指出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告诫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坚如磐石。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措施,扎牢制度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

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2.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
-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3.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编委会.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64.
-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6-307.
- [12] 金怡顺.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特点及规律问题探析[J]. 探索,2019(5):22.

责任编辑:蔡燕飞